

民主黨「拉布」以怨報德

□ 崔寧

回「香港營」才能理性監督

進反對派相關謬論如出一轍，了無新意，完全沒有根據，且完全不顧事實。



議論風生

候任特首梁振英日前表示，對新班子在七月一日「整齊上任」審慎樂觀，並指出，如「架構重組」因為立法會「拉布」未能按時過關，「天不會塌下來」。「整齊上任」，顯示新政府對香港社會和市民大眾高度負責任態度，對議員「急市民所急」寄予期待，急切之情溢於言表；「天不會塌下來」，則是對利用「拉布」手段阻撓新政府調整創行行為的鄙視，新政府勇於正視困難和挑戰，不畏懼反對派的阻撓和破壞。

目前「架構重組」方案在立法會的遭遇，不能不令人擔心。距離政府交接日期越來越近，但是「拉布」的來勢卻愈加兇險。「人民力量」等激進反對派之前揚言要提五百項修訂，現已增加至近千項。公民黨則別出心裁，要求「三司十四局」方案「分拆上市」。民主黨早前提出二十一項動議，聲稱還會增加到五十項，只是會在本周五的財委會上提出。這些都令闖關的難度大增，審議時間被拖長。

激進反對派崇尚「暴力文化」，對「三司十四局」方案採取極端手段，並不令人意外。但是，奉行「溫和路線」的民主黨與之異曲同工，將自己擺到新政府「對立面」，成為「架構重組」的對立方

量，就不免讓人感嘆、費解和失望。

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大概沒有忘記，梁振英在當選後提出的第一個口號，就是建立包括「何營」在內的「香港營」，並提出與落敗的何俊仁會面。這樣做，目的只有一個，希望作為立法會「老二」的民主黨，可以與具有「穩中求變」新思維、志在解決經濟民生深層次矛盾的新政府一起，為香港政制變革、經濟發展和市民福祉，務實地做點事情。

現在看來，民主黨正在用「為反對而反對」的舊思維及缺乏理性的舉動，將這個美好的願望邊緣化，成為「一廂情願」。

阻「架構重組」走向對立面

不願接受橄欖枝，抱着舊衣鉢、依然故我，究其原因，本質上是民主黨缺乏遠見，未能預期新政府將給香港帶來的新變化和新氣象，包括強化行政主導，改善行政立法關係，建立「親民政府」，解決經濟民生深層矛盾等。民主黨要竭力成為反對派的代表，形成所謂最大監督力量，對於即將組建的新政府，不惜在政策上與激進勢力臭氣相投，滑向對立甚至對抗。種種事實清楚表明這一點，在「架構重組」一事上更是如此。

早在四月底，作為「大和解」一項重要內容，

梁振英會見了包括了民主黨何俊仁、涂謹申等在內的一些反對派議員。這是他當選後首次與反對派人士會面。梁振英本人及候任特首辦花了大部分時間，介紹新政府「三司十四局」構想，並詳細加以解釋。在那次會面中，反對派似乎只對「二十三條」是否立法及未來一人一票選舉特首的門檻高低感興趣，對「架構重組」並沒有提出任何實質性建議。

「三司十四局」方案其實只是對現有政府架構的「微調」，只涉及四個部分，並不複雜。一段時間來，梁振英及候任特首辦已經反覆宣明，社會各界及市民大眾對旨在落實梁振英「競選政綱」，推動經濟民生發展的這項安排，亦有越來越深刻認識，贊成擁護者佔絕大多數。

然而，民主黨與激進反對派一脈相承，悖離主流民意，形成阻撓之勢。五月中，何俊仁在《梁振英的語言偽術和用人標準》文章中，大肆攻擊「架構重組」方案，甚至連竭力宣傳推動此方案的候任特首辦主管羅范椒芬也不能倖免。文章指責「三司十四局」方案「疊床架屋」，指責梁振英「欺騙民衆」，強推「架構重組」，拒絕諮詢公眾，以君臨天下之勢，令現屆政府作出配合，更要立法會成為橡皮圖章。他還污衊說，梁振英利用羅范椒芬是違背承諾，令不少人擔憂她將成為新特首的「惡僕」，香港社會和公務員隊伍難以安寧。這些說辭與激

儘管民主黨一再否認在立法會所為是「拉布」，但其主觀動機和所產生的客觀效果卻是清楚不過的，無法抵賴。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李永達就曾公開表示，「所有動議都是公眾關心的實質問題，過去曾多次提出，但候任特首辦一直迴避，因此才動議辯論」。可見民主黨是意在「刁難」，是「有目的」拖延時間，是不希望新政府能夠「整齊上任」。

所提的動議，其實並非如民主黨所說，是「公眾關心的實質問題」，諸如要求問責官員減薪三成及要求「取消副司長」，就不現實，完全沒有道理。對於「減薪」，候任特首辦主管羅范椒芬早就有明確態度：「薪酬檢討需要研究，非短期內能完成」。梁振英本人亦表示「可以考慮凍薪」。這樣的表態在乎情理，民主黨怎能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再說，要求取消副司長，等於把「架構重組」方案中最主要的調整變化加以否定。增設兩個副司長，是要分擔責任，強化決策機制，發揮政府對市場的影響，表明新政府的新思維、新作風。民主黨對此不應有曲解。

針對立法會內「拉布」行為，候任特首梁振英昨日又發表一篇文章，闡述「三司十四局」方案的理念，回應與此相關問題，可謂情理並茂。「架構重組」是新政府推動香港社會變革的第一步，並非可有可無。民主黨不應與激進勢力藕斷絲連，以怨報德，成為社會變革的阻力，應當審時度勢，及早回到「香港營」，成為新政府的理性監督力量。

立會擴權傷害行政主導

□ 孟東

少數反對派已經通過「拉布」牽制了整個立法會的運作，進而影響到政府的整體運作，立法權主導行政權，行政權力漸漸趨於弱勢。究其原因，在於基本法所規定的制度優勢並沒有得到有效落實，必須激活基本法內的行政主導制度因子，才能重構行政主導，依法限制立法會擴權行為。



指點香江

目前新政府架構改組已進入關鍵時期，民主黨和「人民力量」又揚言要提出千項修訂進行拉布，明顯是要癱瘓立法會，阻礙新政府如期上任，從而造成立法會主導一切的政治現實，完全背離了香港《基本法》所強調的行政主導的立法原意。

架構重組落實行政主導

香港的政治體制實質上是一種行政主導體制，這是在港英管治時期被證明行之有效的體制，所以基本法對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的權力配置存在重大傾斜，行政、立法和司法其實是一種互相制衡重在配合的體制，如基本法第72條規定政府的議案優先列入議程，第74條限制立法會議員的提案，還有議案的分組表決機制等，都是為了構建一個強大的政府所設計的。然而回歸後，政治體制的實際運作與制度設想之間存在重大反差，行政權力不斷受到立法權和司法權挑戰，特區政府日益陷入管治困境。

在2012年第四屆特首選舉之際，梁振英根據香港目前的政治現實提出「穩中求變」的施政綱領，就是要落實基本法構建一個強政府，提升政府的管治能力，解決香港存在的一些深層次問題，以及貧富差距、經濟轉型、房屋等民生議題。在競選過程中，「穩中求變」的理念迎合了香港的現實需要，以高票領先於另外兩位參選人，贏取了選舉委員會和廣大市民的雙重民意支持，成功當選並被中央政府正式任命為香港下一任特首。

為了落實「穩中求變」政綱，候任特首梁振英提出架構重組方案，對高官委任制進行改革，通過理順職能，依法增設機構，提升施政

效率，改變特區政府自回歸後受制於立法、司法的局面。反對派並不希望梁振英及其強勢政府的建立，所以在新政府架構重組議題上百般刁難，利用立法會議事規則的漏洞進行「拉布」，揚言欲在人事編制委員會和財務委員會上提出千條動議或修訂。

「拉布」背離主流民意

民主黨這次參與反對派拉布行列，與人民力量和社民連同流合污，基本上有兩大目的。一是阻礙梁振英新政府順利重組架構，給新政府冠以無能的形象，避免強勢政府的建立，從而提升民主黨的影響力。二是籌劃奪取超級議席。今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中的「超級議席」吸引力巨大。

政黨以參與選舉獲取政權為存在目標是可以理解的，但為了短期的狹隘利益，犧牲政黨的政治前景卻是十分不道德、不明智的，也是背離主流民意的。根據香港民意調查中心的最近一份民意調查，高達71%的受訪者不贊成議員用「拉布」方式，阻止立法會在7月1日前通過重組政府架構方案，59%受訪者認為應該在7月1日新政府上任之前，完成架構重組的工作。還有，早前幾個公務員團體，都已先後發表聲明及去函立法會，明確支持新政府及時完成架構改組，這是基於他們看到梁振英誠心誠意地要加強政府與公務員、政治團體和市民之間的聯繫，希望給候任特首一個空間。

民意態度很清晰，大多數市民是支持架構重組，反對無故「拉布」為難政府，希望「變」的理念能給香港帶來新氣象和新機遇，構建一個強勢有為的新政府。民主黨和人民力量意圖阻礙新政府施政，無視民意的迫切需求，背離民主政治的精神，必將香港的民主發展之路引向歧途，最終損害的是香港人的整體利益。

從形式上看，反對派必定會為架構重組設

置障礙，不會主動放棄「拉布」給新政府讓路。如果按照既定法律程序，讓重組方案先經過人事編制委員會辯論，再得財務委員會的撥款後，然後移交立法會大會進行辯論表決，恐怕新政府幾乎無可能在7月1日前完成改組程序。

激活基本法制度優勢

少數反對派已經通過「拉布」牽制了整個立法會的運作，進而影響到政府的整體運作，立法權主導行政權，行政權力漸漸趨於弱勢。究其原因，在於基本法所規定的制度優勢並沒有得到有效落實，必須激活基本法內的行政主導制度因子，才能重構行政主導，依法限制立法會擴權行為。

既然基本法第72條賦予政府議案的優先權，《議事規則》第18條也有類似制度規定，如果架構重組在人事編制委員會和財委會無休止辯論，根本沒有什麼可能性可言，現屆政府要勇於跳過上述程序，依法要求立法會更改議程，將架構重組列入優先重點議案進行首先審議，屆時立法會主席便可依法辦事。同時，基本法第74條要求議員提出的草案，不能涉及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否則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意見，有人建議會主席可以據此要求凡是提出修訂的議員，提議案前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意見，否則不予採納各項修正案。即使他們得到行政長官的同意，會主席也可以再次「剪布」，結束議員的繁冗無休止發言，直接進行逐條表決。

根據基本法，立法會對行政權只是擁有有限的審查權，立法權根本制衡不了行政權，而為什麼原本的行政主導制度設計，在實際運行中出現如此大的反差？根源在於政府並沒有很好地認識到自己的權力所在，對於政府來說，一些有利制度設計只是一種擺設，沒有被政府激活並得到很好的使用。

美始終是兩岸和平「絆腳石」

□ 蘇虹 何溢誠



台海動向

台海或南海動武，從一開始就會是多國介入的軍事衝突局面，而不僅限於台海或南海。

這份不過二十頁的報告，雖然全文了無新意，充其量只不過是2012版的「中國威脅論」，但用心「一石二鳥」相當險惡。

報告稱，台灣本身在抗拒中國軍事威嚇方面可以針對中國的導彈和空中攻擊，強化主要的軍事基礎建設，例如機場以及指管體系節點。台灣應該在反艦導彈、陸基巡航導彈、柴油潛艇以及布雷能力等方面加強，以便讓中國大陸付出更高代價，以嚇阻中國大陸發動兩棲攻擊，並拖延衝突進行的時間。

怎樣才能達此目標呢？「藥方」就是繼續花大錢，購買美國武器！於是乎，美國樂見甚至操縱的兩岸關係「緊張」直接的效果便是，李登輝執政十二年軍購一百六十二億美元，陳水扁執政八年軍購八十四億美元，馬英九就任四年軍購更是達一百八十三億美元。5月18日，美國眾議院又通過一項法案，批准向台灣出售至少六十六架F-16C/D型戰機，以幫助台灣抵禦所謂「來自大陸的軍事威脅」。這還不夠，由於「中國的導彈愈來愈有可能在戰時封鎖台灣機場」，「台灣應該在反艦導彈、陸基巡航導彈、柴油潛艇以及布雷能力方面加強」。使台灣繼續充當美國軍火商的提款機！

宗旨不變的遏制

AEI在兩岸第八次「兩會」商談前夕拋出這份報告，除去挑撥兩岸關係、兜售軍火的目外，也暴露了美國一些政客遏制中國的不變思維。

美國從上世紀末開始對華採取「戰略威懾，前沿圍堵，誘壓並舉，以壓為主，避免大戰，有限打擊，多方準備，以快制勝」的軍事戰略。1999年4月，美國總統克林頓發表對外政策講話，指出「一個強大的中國將來可能會對美國提出潛在的挑戰」。「中國是美國潛在競爭對手」的看法是美對華的基本戰略判斷，也是美國制定對華軍事戰略的出發點和立足點。根據美國國防大學1998年以來的戰略評估報告稱，美對華戰略是通過聯盟關係和前沿軍事存在來實施的，目的是防止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崛起。美2000年版的《國防報告書》直接將中國和俄羅斯視爲「最有可能在2015年以後成爲美全球競爭對手的國家」。美參謀長聯席會議發表的《2020聯合設想》公開聲稱，中國不是美國的「戰略夥伴」，而是美國的「戰略競爭者」。因此，如何防範「中國對美日趨強勁的威脅」是美制定對華軍事戰略的中心課題。可以肯定的是，2015年以後美對華的戰略攻勢和戰略防範都將不斷加強，將中國視爲它未來全球範圍內的主要競爭對手的各種因素也在不斷強化。

滿清時期，列強侵略中國，美國沒有缺席。二戰過後，由美國主導的全球利益重分配，中國不僅沒有被善待，還吃了暗虧。美國眼裡只有自己的國家利益，沒有公平的兩岸正義。循此，AEI拋出的這份報告，不過是害怕兩岸逐漸形成擁護之勢的符咒。兩岸和平需要兩岸的炎黃子孫共同努力。兩岸民眾更要清醒地認識到：對兩岸的和平發展而言，美國始終是一塊「絆腳石」！

(蘇虹，中央；何溢誠，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生，國民黨中委委員)

滬推國際板 港有危有機

□ 蘇偉文



蘇偉文



經濟前瞻

在倫敦市場發表的環球金融中心排名中，上海的位置越來越重要，在中國內地已隱然成爲各國金融中心的龍頭。上海要發展成爲與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配的国际金融中心，其中一項策略就是推出國際板，即容許外地企業到上海上市。而這個構思已說過好一陣子，但到了最近才算有了新的進展。

上海早前傳出消息表示，上海國際板的構思，是傾向引入跨國企業整體上市，而非將跨國企業的中國業務分拆出來。也即是說，將來在上海國際板買賣的外國公司股份，其股權和其他市場買賣的無異。

外企集資會轉投內地

對上海來說，其成立國際板的一個目的，就是要打造上海成國際金融中心，若果外國企業是以整體來上海上市的話，則更能達到這個政策目標。這是一個金融中心戰略的考慮，因爲只是將中國業務分拆在上海上市的話，就很容易將上海國際板內地化，變成外國在華分公司的本大營，結果國際板上的公司，除了公司名字是跨國企業之外，內裡實在的跨國元素卻是不多，這樣一來國際板和主板的分別便很模糊了，也和國際板的本意相違背。這樣的國際板不能達到政策目標，即不能達成將上海金融市場和國際接軌的目標，因爲在上海國際板買賣的股票和海外的不一樣，是無法藉國際板的成立而將上海金融市場推向國際。所以，在上海的戰略考慮上，必定是希望在國際板上市的外國企業是以總體來上市。

這個總體上市構思布局，對監管機構來說也有實在的監管作用。中國內地現在投資渠道不多，股市假如有外國企業上市，尤其是外國的大品牌，或會吸引內地投資者盲目炒作，這些國際板公司的股價難免產生波動。如果是內地的跨國企業將其業務分拆上市，因這些公司其實是純內地業務，內地投資者的炒作便缺乏參考價，一旦炒作過頭，難保會有很大的反響。若是外國企業總體在上海上市，海外股價便成了投資者的參考價，縱使內地投資者如何瘋狂炒作也好，起碼也不會和外地股價有太大的差距。然而，從香港H股和上海A股的經驗來看，只要內地資本帳仍未開放，資金套利無法完全進行，同股不同價的現象還會存在。因爲對投資者來說，同樣的股票在兩個不同的市場，可當作兩個完全分隔的買賣，但兩個市場股價多少都會有所關聯。

從另一個角度看，跨國企業選擇在上海上市，它們集資得來的人民幣，可以用來投資內地業務，因此也會刺激外國企業在內地的投資。而一個引伸出來的現象，將會更多跨國公司在上海設置運籌總部，因爲上市後的人民幣資金自然會投資在內地，當這些機構的業務在內地聚集，它們在上海設立營運中心、甚至是區域總部都是自然之舉。對上海來說，更多的跨國企業以其作營運總部，除了鞏固其金融地位外，更加有利上海其他營運業務的發展，例如航空和貨運的向前步伐，將會因國際板的出現，從而受到正面影響，這是一個很明顯的界外效應。

有滬競爭港會更進步

然而，上海國際板所遇到的問題也不少，首先是資本帳還未開放和人民幣的兌換問題。要達到上文提過的一些好處，其中一個條件是資金可以自由流動，例如上海的金融活動要和國際接軌，資本套利就必須要在無阻礙地進行。可是，這又會帶出了金融安全的考慮，因爲現在中國的金融體制還不是很健全，避險工具沒有外國的多元化，外國投資者大可在國際板將股價炒高，然後在外國股市以保證金、衍生工具等形式將股票造空，而令中國投資者在高價接火棒。所以在與外國市場接軌的考慮上，如何平衡風險和如何進行，都是要小心研究的課題。

對香港來說，上海的崛起無異是多了一個強勁的競爭對手。上海推出國際板或多或少會影響着香港，而即使按中央的構思，滬港兩地是可以分工，但金融理論告訴我們，良好意願的金融分工，其實並非最有效的分配。上海和香港要經過良性競爭後，才可找到各自的定位，而香港不需要害怕了上海這個對手，反而因競爭多了香港也會更進步，進步才是對付競爭的不二法門。

作者為恒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

齊心說不

保龍